

## 第二章 互賴理論的探討

### 第一節 互賴理論的起源背景與發展

互賴理論是現代國際關係學的重要理論之一。但國際之間互賴關係早已有之，起源可追溯至在修昔底斯(Thucydides)所處的古希臘時代，雅典和斯巴達的軍事安全就是相互依賴的。18世紀的歐洲，當重商主義興起之後，法國學者就有提出互賴的觀念，認為國與國交往並非完全自我謀利，而是有互賴的關係。10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多次使用「相互依存」來表述資本主義市場的世界性和國際性。恩格斯指出：「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個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繫起來，既而使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受著另一國家的事業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說：「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存所代替了。物質的生活是如此，精神的生活也是如此。」世界是一個大市場，整個世界應是相互依存的(倪世雄，2003：446)。互賴理論的思想與自由主義及理想主義有密切的關係，其基本主張都認為國家之間的互動是可以發揮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精神，即彼此互相幫助，互相協調，共同創造最大的福祉。雖然各國之間有不同的差異性，但透過國家與人民的交往，各種資源、產品、及人力均可互相交流，互相分享使用，以促進國際的發展(顧長永，2000:14)。

儘管相互依存現象存在已久，但是作為一種較為系統的理論，互賴理論最早見諸於庫柏的《經濟互賴》(1968年)<sup>23</sup>。此因歷史的演進，自20世紀以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緊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於1945年結束後，緊接者為世界冷戰；即西方民主國家對付共產國家的對外侵略，當時乃有東西兩方與中立國家形成了三個並存的集團。聯合國成立，代替了已失敗的國聯而為永久的國際組織。戰敗的德國與日本，不但於短短的數年之內重獲獨立，且很快成為世界經

---

<sup>23</sup>庫柏認為，貿易、投資及資金流動等因素，已促使一個高度互賴、整合的全球經濟逐漸成形。然而，世界各國卻持續利用各種貿易保護措施、補貼及產業政策等手段，試圖抗拒前述的整合力量。各國的作法更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大隱憂。他指出，全球經濟的持續發展正在不斷分化過程中所出現的矛盾與緊張，不僅造成經濟情勢不穩定，同時也損及全球經濟體系原有的效率與自由開放的特性。尚可參閱 Cooper (1968:15-38)。

濟大國。中共於 1949 年建立政權，更直接影響遠東國際局勢。到了 1960 年代，中立國家逐漸失去功能，美蘇兩國成為超級大國，共黨國家的分裂，再加上中共與法國的核子武器試驗成功，這些歷史的發展都深刻地影響主權國間體系的情勢。這段期間，現實主義的地位進一步的提高，成為英美思考國際事務的新的正統方法。集團間的鬥爭，使人們對國際法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也強化了權力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這種方法上的變化在美國來得尤其迅速，因為歐洲均勢的崩潰意味者美國不再僅僅充當歐洲紛爭的平衡者，而是憑藉其遙遙領先的優勢，把充當霸權國家<sup>24</sup>的使命承擔下來。

在這舊秩序下的國際關係，以各個民族國家本身的利益作為運作主軸。民族國家的出現，揭開歐洲近代史的序幕。形成民族國家的最主要物質基礎，正是一個民族在一定的經濟活動範圍內的共同利益。由於受到當時的經濟條件和經濟規模的限制，不同的民族國家之間很難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因此，為了保護本身的利益，「主權至上」的概念逐漸成為規範國際關係的準則，而民族主義作為保護本身利益的意識形態，也逐漸取得支配性的影響地位。換句話說，在舊秩序下的國際關係架構裡，「主權至上」是天經地義的，民族主義也是天經地義的。這種價值體系，正是近代以來國際法思想的主流。

但是，隨著某些民族國家發展成為侵略和殖民的帝國主義國家，這種價值體系呈現出明顯的缺點。這種帝國主義一方面強調本身主權的神聖性，可是另一方面卻毫不猶豫地以軍事和經濟手段踐踏殖民地被殖民者的集體主權。既然主權至高無上，主權者的意志不應受任何限制，即使侵犯其他國家的主權也未嘗不是合法和正當的事。在這種雙重標準的思考下，帝國主義掌握了發動戰爭的權力。為了保護自己的主權完整，武力被視為是合法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因為帝國主義者可以不尊重別人的主權，又可以只依循強弱勝負法則，而別無其他限制，結果大部分的軍事行動不僅是針對亞、非洲的殖民地，即使是在各帝國主義者間兵戎相見的場面也層出不窮。19、20 世紀成了戰爭烽火連綿不斷的恐怖時代。戰爭陰影不只吞蝕小國弱國，也持續地籠罩大國強國。

在二次大戰後，政治現實主義席捲了美國以及各主要國家的國際關係領域，

---

<sup>24</sup> 在這一時期，一個霸權國家，不但要具備制定和維持各種世界政治規則的意志，也要具備制定和維持規則的能力。

它的理論對手幾乎毫無招架之力。或許是因為冷戰令人心生畏懼，或許是因為現實主義檯面人物言詞雄辯或論據有力。自 1945 年以來，美國外交政策辯論的表達語言，很大程度由政治現實主義所獨攬。即是說，使用的不是有關理想或規範的語言，而是有關權力和利益的語言(Keohane, 1986:8)。從 1948 年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sup>25</sup>的《國家間的政治：為權力與和平的鬥爭》發表，到 1979 年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的《國際政治理論》(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問世，政治現實主義主導西方國際關係研究三十餘年，現實主義一直是國際關係學界公認的理論範式。現實主義認為衝突是國際關係的根本特徵，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雖然摩根索將衝突歸於人追逐權力的本性，華爾茲將衝突歸於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兩者有所區別，但由於人性和無政府性都是高度穩定的因素，所以，國際衝突根本上是不可更變的。

現實主義在 20 世紀 70 年代達到峰巔，代表性著作就是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這部著作自 1979 年問世以來，一直被尊為新現實主義的開山之作。其無論是對摩根索傳統現實主義基本理念的發展還是其嚴謹的層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簡約的科學特徵，都被認為是達到了國際關係研究登峰造極的境界。尤其是華爾茲對國際體系無政府性的強調和對權力分配的關注，為新現實主義構建了結構主義的理論大廈(秦亞青，2002：2)。華爾茲在該書中對現實主義作了精湛的修正，對摩根索的政治現實主義進行了結構主義的改造，融入了系統論等科學主義的東西，創立了一種在邏輯上比起摩根索、卡爾<sup>26</sup> (Carr)等 20 世紀學者們更為縝密的現實主義學說，因而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它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區別國際政治體系及其互動的組成部份，即國際政治的基本單位。它立論的核心是只有結構的變革才能改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倪世雄，2003：32-33)。

當然，華爾茲像早期的現實主義者一樣，將國際關係視為權力鬥爭，論述中體現了現實主義特徵的三個核心假設：國家是統一的單元 (coherent units) 和最重要的國際政治行為體；武力是可用和有效的政策工具，甚至是行使權力最有效的工具；世界政治中的問題 (issues) 有等級之分，占主導地位的是軍事安全問題。華爾茲還假定，國家彼此間相似，理解國際政治的關鍵，與其說是在國內政治的

<sup>25</sup> 關於現實主義的當代經典論述，可參考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系列著作，尤其是：Morgenthau (1946；1948；1952：961-988)等。

<sup>26</sup>關於此時期「現實主義」的另一種同樣重要的論述，參見 Carr (1946)。相比而言，卡爾比摩根索更強調權力的經濟淵源。

本質，毋寧說是國家間的戰略互動。合作是稀缺的，因為國家追求相對的利益，而且必須依靠自身而非他人的力量去追求它；國際組織和國際法相對而言是不太重要的國家戰略工具。(Waltz,1979:66)。

後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中產生了許多很有影響的著作，如卡普蘭(Morton Kaplan)的《國際政治中的系統與過程》(1957)、華爾茲(Waltz)的《人、國家與戰爭》(1959)、克拉斯納(Krasner)的《界定國家利益》(1978)、奧根斯基(Organski)和吉爾平(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戰與變革》(1981)等等。雖然這些現實主義學者強調了國際無政府性的不可改變，但是他們深思的問題，或者說他的理想，是如何減弱國際無政府性和因之產生的衝突。他們有高度的共識，認為達成和維持和平的關鍵因素是實力，根本機制是大國間的實力分配和力量制衡。不論是主張單邊和平的霸權穩定說，主張兩邊和平的恐怖均勢說或是多邊和平的勢力均衡說，無一不是將衝突作為國際關係的基本要素，把和平與國際權力分配聯系在一起，認為決定大國命運、決定世界命運的關鍵在於權力結構的天平呈現何種狀態。同時，從這些著作之中，我們雖然可以看到對西方思想家的繼承和發展，但是更加明顯的是二次大戰的遺產和冷戰的烙印，是對國際衝突的強意識和對實力的高度重視。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是戰後國際關係學知識譜系中的重大結晶，也成為戰後國際關係思想發展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秦亞青，2002：2)。

在政治現實主義主導西方國際關係研究三十餘年之後，新自由主義開始對其起挑戰。新自由主義認為衝突雖然是國際體系無政府性的產物，但它通過對國際機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扮演的功能價值的分析，說明國際機制對於促進「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對減少世界政治經濟中的紛爭與衝突是有價值的，國際社會成員可以創造條件，達成合作。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美國霸權衰退的聲浪之中，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派別越來越關注如何應對和控制住他們所認為的日趨脆弱與衰退的經濟，這不僅為決策者而且為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們認識到是一個嚴重的問題。<sup>27</sup>

---

<sup>27</sup>隨著冷戰式安全威脅感的減弱，國外經濟競爭與國內分配衝突增加了。種種相互矛盾的捲入均假借「國家安全」的名義，國家安全概念的模糊性越發明顯。尼克森(Nixon)總統認為，五大主要力量中心(美國、蘇聯、中國、歐洲、日本)構成全球均勢，他試圖沿用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應對美國戰後盟國在經濟上的挑戰、蘇聯和中國的軍事行動，卻徒勞無功。參閱 Keohane and Nye (1977:25)。

尤其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sup>28</sup>、石油危機的出現以及越南戰爭的失敗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拉上了台面，這樣的國際氛圍為新自由主義學者們開闢了揮灑自己才能的天地。他們開始質疑物質性權力在維持世界穩定中的作用。雖然現實主義學者繼續探討什麼樣權力結構格局最可能保持國際體系的穩定與世界的和平、其他流派的學者卻開始探索非物質性權力因素的作用和意見。其中，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尤其突出，新自由主義認為傳統現實主義的世界政治理論是一門「沉悶的科學」(a dismal science)。<sup>29</sup>在冷戰後西方世界的外交政策中，無論是貿易自由化的推廣，還是民主制度的擴展，新自由主義的外交理念都在其中佔據中心的位置，迅速形成了與新現實主義兩分天下的局面。

互賴理論一般被認為是一種國際關係中的新自由主義，相互依賴理論在發展的初期，就提出了「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的觀點。該理論認為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接觸與交往直日益廣泛和頻繁，並且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裡相互滲透，它不否認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中心地位，也承認國家利益和力量的作用。但是，互賴理論認為國家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構成了一個互相依賴的關係，這種關係又制約國家的政策、利益和力量。同時，國家內部和外部也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非國家行為體的增多和作用的增強，也造成世界、地區相互依賴的網絡。西方整個 70 年代是其發展的興盛期，國際關係理論學者言必稱相互依存。其背景是：(倪世雄，2003：433-434)

第一，美蘇兩極格局開始鬆動，兩大陣營之間的交流和合作不斷增加，冷戰對抗與美蘇緩和同時存在。

第二，在西方，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發生動搖，西歐、日本在經濟上的崛起使世界經濟的「從屬性一致」開始瓦解，並被「相互依存論的不一致」所取代，

第三，全球範圍內的各國經濟聯繫不斷加強。加強了各國的相互依賴，尤其

<sup>28</sup>外匯買賣的長足發展是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才開始的，當時以固定匯率制度為特點的「布雷頓森林體率」已經不能適應世界經濟的發展，國家之間經濟發展速度的不同迫使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宣布放棄對本國貨幣固定價格的維護。自此之後，世界各主要貨幣之間的比價關係主要由市場供需力量所決定，實行不同形式的浮動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的產生使國際間外匯買賣的數量呈現幾何倍數的成長，其參與者不僅有出於實際需要的使用者，還有出於盈利目的的投資者，既有各國的中央銀行，又有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各類中介機構。關於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機制的崩潰，可參見：Gowa (1983)、Odell(1982)、Yoffie(1983)等學者的著作。

<sup>29</sup>因為傳統現實主義的根本假設把世界政治簡單地視為權力遊戲的戰場，認為世界政治是在不斷地戰爭和衝突中進行的，

是經濟的相互依賴，這是現代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是世界經濟發展推進的結果。

第四，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mpanies, MNCs)、國際組織、國際制度發展迅速，以非國家角色的積極姿態登上國際舞台。

最早在 60 年代末敏銳地看到這一變化，並作出理論思考和分析的除了理查德·庫珀之外，還有卡爾·杜意奇。杜意奇在《國際關係分析》中指出，研究國際關係不能僅僅以國家為中心，要重視國家間互相聯繫和相互依存。1977 年，基歐漢(Keohane)和奈(Nye)的《權力與相互依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問世，是一部頗有理論建樹的力作，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在學術界產生很大的影響。(倪世雄，2003：204-205)

1977 年，《權力與相互依賴》第一版出版，標示著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學派挑戰新現實主義理論主導地位的開始，權力與相互依賴的理論主題—特別是複合相互依賴模式—構成新自由主義制度興起的理論基石。並在批判分析權力政治學派的基礎上，提出國際機制概念及國際機制變遷的解釋模式。在現實驗證部分，作者分別從海洋領域、國際貨幣領域、美加關係、美澳關係等方面就國際機制變遷予以解釋，驗證自己的理論主張；剖析美國與複合相互依賴的關係；1989 年，該書重版並增加了對批評的回應；2001 年該書第三版出版，兩位學者將全球化、國際機制與相互依賴概念相整合，指點國際局勢，對 21 世紀初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進行嚴肅的理論分析，成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義發展的巔峰之作。自 1977 年以來，該書一直是國際關係研究引用頻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被視為「不可替代之作」。(門洪華，2002：9)

基歐漢和奈摒棄「國家是唯一行為者」的主張，認為戰後國際社會中國家間(interstate)的跨國(transnational)關係的發展促使人們更加重視對國際層次的諸行為者的研究，重視對超越國界的相互聯繫、結盟關係和相互依賴的研究。在基歐漢和奈看來，工業化國家所出現的情況特徵是一種比現實主義學者所聲稱的要複雜得多的行為體和問題模式。由於現代化過程的影響，軍隊以及相關武力因素的重要性已經不如以前了。它接受商業自由主義的看法，即經濟的開放會產生有利於和平而不是有利於擴張征服的激勵因素。所以經濟相互依賴只是和平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能不能產生和平，最終取決於國際制度的效用，成熟的自由主義認為貿易擴展導致的國際相互依賴對國際和平是重要的，但僅由此並不必然帶來

和平，還應該通過國際制度的力量，使相互依賴關係處於一種制度化的模式中

基歐漢和奈的學術合作使他們共同成為了國際關係學界有關的理論論戰的中心人物。互賴理論作為一種新理論雖不是由他們倆所首創的，但他們卻是互賴理論倡導者與集大成者。他們對國際關係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們能夠將其他學者已經討論過多年的理論加以綜合、分類並使之更為準確。從另一個角度上講，他們對國際關係的看法似乎也是隨著他們之間合作關係的形成而得到了實質性發展。

隨著時間的演進，自 80 年代以來，國際相互依賴明顯因為經濟全球化<sup>30</sup>而進一步增強。跨國性的旅遊、通訊、貿易、大眾傳播、進修學習、通婚、文化交流等，促使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主要表現在：第一，高新科技的進步更加迅速，並在生產和生活中得到廣泛的應用，以資訊技術為中心的科技革命成果能迅速轉化為生產力，而資訊技術的發展，使國際間的通訊、資訊流通更加快捷和便利，為全球經濟一體化提供了條件。第二，國際間的資本流動加快和擴大，資本流動出現了新的特點。不僅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流動、發達國家之間的流動，而且出現了新興工業化的國家或地區向發達國家流動，以及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內部的流動。與此相適應的跨國公司也獲得大發展。不僅發達國家有跨國公司，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也出現跨國公司；跨國公司不僅存在於生產領域，也存在於流通、消費領域。跨國公司家數迅速增加，規模越來越大，日益成為世界經濟主體，是全球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推進因素。在 1968 年，跨國公司家數為 7,276 家，但在 1997 年，已增長至六萬家，而跨國公司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已高達 50% 以上，佔對外貿易投資的 80% 和研究經費的 90% 左右。第三，國際貿易更加廣泛，各國都把發展經濟視為首要任務，在經濟上的相互合作和競爭也不斷加強，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和擴大，WTO 所追求的精神就是投資貿易自由化。可以說，現今已基本形成一個世界市場。世界經濟出現了上述幾方面的變化，因而出現了「全球經濟一體化」、「地球村」的新概念。此也不可避免將造成各國在經濟上相互

<sup>30</sup> Roland Robertson 最早發表以全球化字眼為標題的文章，根據他的定義：「全球化作為一種觀念，同時指涉世界的壓縮(global compression)以及增強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意識。這兩者凝結了二十世紀的全球互賴與全球整體意識。」而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院長 Anthony Giddens 則指出全球化的定義：「現在的世界社會關係的聯繫，可連結到遙遠的當地，因此本地發生的事乃由遠處發生的事件所形成，反之亦然。」從以上兩位學者對全球化的定義中，可以發現：由於新興科技所帶來的時間與空間上距離感的縮減，使得國家與國家間的互動更顯頻繁，成為「無遠弗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密切關係，結果所致使全球化成為一種普遍存在、到處可見的現象，以上參見 Keohane and Nye (2001:306-310)。

依賴的更加密切。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其發展過程是長期的、曲折的，同時也是一個經濟實力和政治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冷戰終結的經濟影響伴隨著社會改變，自由主義似乎已經取得了勝利，佛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稱之為「歷史的終結」固然過於簡單化，但1989年之後自由資本主義再無一個對手，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許多排他性的社會反應，經濟全球化也許增強了這些反應，但他並沒有產生支配性共同意識型態，不像工業革命造就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那樣，作為全球化反應之一的反美國主義(anti-Americanism)並非團結一致。(Keohane and Nye,2001:299)

發展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於主導和支配地位，但依然面臨挑戰；發展中國家總體上處於不利地位，但也面臨新的機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將引起國際經濟關係的新變化，也影響著世界政治的發展和國際關係的變動。

經濟全球化必將導致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全球化。強勢經濟實體與強勢經濟實體的控制將成為經濟全球化時期國際關係的主要矛盾。從總體上看，經濟全球化將促進各國以合作和協商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有利於推進世界多極化進程和國際關係民主化。

衛靈(2005：23-26)將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分析如下：

#### 一、經濟全球化對傳統國家主權觀念造成衝擊

經濟全球化涉及到的不僅只是金融、資本、投資、技術、勞動力的流動而已，也牽涉到跨國間的管理制度(regulatory institutions)網絡的擴張，此勢必隨著全球化之發展擴張，將直接衝擊到國家的主權與管制，而導致絕對主權(absolute sovereignty)的看法將淪為歷史神話。(Holton,1998：68)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相互依存關係首先表現為經濟上無法割斷的聯繫，它是市場經濟向全球擴張的必然結果。在此過程中，原本一國獨有的部分權力，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無所不在的跨國公司一方面可以通過子公司繞過本國政府對他國制裁的禁令去追逐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跨國公司還可以影響到所在國的經濟決策。這是對國家主權理論的一個嚴峻挑戰。經濟全球化強化了國際組織等國際行為體的政治協調功能<sup>31</sup>

<sup>31</sup>當今超國家實體已經擁有其成員國的部分國家主權行使功能。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如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都在推進經濟整合進程中被其成員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賦予一定的國家主權行使功能。歐洲聯盟的整合已超出經濟領域而有了共同體意義的獨立政治機構與制度框架。超國家實體



，削弱了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功能。

## 二、經濟全球化下國際關係發生深刻調整

經濟全球化進程將導致國際經濟關係的新調整，而國際經濟關係的調整將會引起國際政治關係的新變動。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種國際行為主體都試圖通過國際政治活動來實現各自的利益和目標，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確立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關係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包括：其一，經濟關係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的核心問題。其二，世界經濟政治化、世界政治經濟化。世界經濟決定世界政治，世界政治反作用於世界經濟。其三、國內政治國際化，國際政治國內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界線日益模糊，國際政治國際化的現象與日俱增。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的加深，國家權力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會受到削弱，而市場的作用在國家安全系統中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由市場力量主導的經濟安全，比政治安全、軍事安全表現得更具體、更細緻，也更有利可圖。相對於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和硬性力量而言，它是一種極富彈性和穿透力的較分散的軟性力量。在未來一個時期內，強大的經濟實體與強勢經濟實體的控制與反制將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關係調整的一個重要方面。

全球化是當代的「時髦用語」(buzzword)。全球化的發展與影響顯然使得代表新自由制度主義的 Keohane 和 Nye 提出的互賴理論在 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增加了可驗證性。數十年來，互賴理論已成為西方國家研究國際關係的主流意識，尤其近年來，更成為顯學。全球化因此不但是文明發展的趨勢也是危機，全球化所構成的分化整合複雜性內涵，由於愈來愈脫離人類解決事務之舊有範疇和制度，也由於其牽涉的變數和不確定性愈來愈高，所涉及的價值爭議愈來愈大，並且必須面臨判斷和決定要求的時限愈來愈短(甚至要求即刻解決)。因此，其承擔的風險和挑戰也愈來愈嚴峻。亦即，全球化時代宣告人類進入高度不確定性、計算性失靈、控制性失靈的風險年代中，並且造成世界性的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階段。以金融全球化為例，1997 年倫敦外派駐新加坡之金融操作員的不當操作，除了造成其百年老牌公司的倒閉，也引發了全球金融的振盪，更間接的觸動了東南亞金融

---

在主導地區經濟和社會事務發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全球性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均被賦予了部份超國家實體的功能。

秩序的潛在弊病與風暴；再以生態全球化為例，1997年印尼森林盜砍引發大火所造成的區域性霾害，飄洋渡海，形成東南亞各國嚴重空污與老人和兒童死亡案例，並迫使位於新加坡之矽晶圓廠停止生產，除了在生態面上，也在經濟面上損失不貲。這二個簡單的例子意謂著全球化風險與複雜的內涵與日俱增的情形。(周桂田，2001：5) 從而促使了國際相互依賴的廣度真正擴大，尤其2001年9月11日美國本土遭受的恐怖攻擊事件，2003年初的美伊戰爭，以及在2003年3、4月間在中國大陸、香港、越南、加拿大、新加坡和台灣等地爆發的非典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全球矚目，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置身事外，更讓人深切感受全人類都已處身在一個共榮共存、相互依賴的地球村，只要全球化繼續深化下去，國家或其他行為體就會發現，它們的價值觀越來越受到他者行為的影響。一方面在全球化發展浪潮衝擊下，另一方面又在國家調節和掌握國家發展之同時，國家的全球治理能力便受到重視。特別是在知識經濟、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跨國經濟連結、資訊科技創新、國際組織建構等的交錯發展下，將更加凸顯國家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能力提升的重要。因此，它們將尋求管理相互依賴的影響，即管理全球化，其表現了國際事務的多元化與相互依賴深化現象，形成了全球性的結構面向。<sup>32</sup>

這種治理可以採用多種形式，在此列舉出五種形式：(Keohane and Nye,2001:311)

- 1.在領土疆界內採取單邊國家行為，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標準，增強競爭力；
- 2.強國或國家集團採取單邊行動，以影響領土之外的國家、企業、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
- 3.區域合作，增強政策的有效性；
- 4.全球層次的多邊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國際機制<sup>33</sup>；
- 5.跨國和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會」—以管理全球化，其方式不涉及一致性的國家行為。

<sup>32</sup> 有關全球化治理的著作，可參閱：Keohane and Nye(2000a:1-41；2000b:104-119)、Keohane (2001:1-13)、Nye(2002)等。

<sup>33</sup> 有關解釋國際機制的演變和維持的著作，可參閱：Lipson(1985)、Krasner(1985)。

## 第二節 互賴理論的意義

由於基歐漢和奈是互賴理論的提倡者與集大成者，本章有關互賴理論的意義與內容，大部份是引自他們二人的著作，尤其是《權力與相互依賴》，這本書對相互依賴理論作第一次系統、全面、深入的解說，因此，可視為相互依賴學派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本節將分析基歐漢和奈如何將從一般社會科學引申出的新理論應用到國際關係領域，由此便可以展示一幅有關互賴理論更為細緻的圖畫。

### 壹、相互依賴的定義與概念

一般而言，依賴(dependence)指的是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響的一種狀態。杜非爾(Duvall)則從兩方面說明依賴的概念。其一，在16世紀時，依賴是指「一種有條件的情況或者制約關係(a state of contingent or conditional relationship)。」也就是一方情況被另一方所制約或決定；其二，到了17世紀，依賴被使用在特殊的意思上，是指「一種從屬或支配的關係(a state of subordinate or subject relationship)。」(Duvall,1978:61-62)而相互依賴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學術界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釋。陶意志(Karl W. Deutsch)和華爾茲(Waltz)認為相互依賴的關係只能存在於勞動分工和職業專業化的條件中，一旦雙方趨於相等，均能生產相同產品時，即不存在相互依賴的關係。羅斯克蘭(Rosecrance)則認為相互依賴是「一國可以直接的對它國國家事物造成衝擊。」(Rosecrance,1977:426)，或者「一種利益關係，在此關係下某國會由於它國國家狀態的改變而受到影響。」(Rosecrance and Stein,1973:2)。霍夫曼(Hoffmann)認為，相互依賴意指「社會的相互滲透」，「世界經濟中不同國家政策的相互聯繫」。吉爾平(Gilpin)指出，相互依賴指的是「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關係」(Gilpin,1989:24)。這就是所謂「非對稱相互依賴或相互依賴的非對稱性(Waltz,1979:178)。」馬利(Mally)則把相互依賴依定義為「一種複雜的跨國現象，它包含國家之間多層次、多方面的互動模式，並產生明顯的相互敏感性和脆弱性」。他還把互相依分賴為四大類：安全相互依賴、生態相互依賴、經濟相互依賴和政治組織相互依賴(倪世雄，2003：436)。

基歐漢和奈則認為：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即彼此相依賴(mutual dependence)，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賴，指的是以國家之間或不同國家的行為體之間相互影

響為特徵的情形,相互依賴意味著一種「利益關係」:其中一方的變化,其他方面會受到這種變化的影響。相互依賴還意味著一種敏感性,即一個國家對經濟等方面的外部世界的「敏感程度」(Keohane and Nye,1989:8-9)。

相互依賴的影響往往源自國際交往—跨越國界的貨幣、商品、人員和資訊流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交往急劇增加。然而,這種聯繫並不同於相互依賴。人類交往對相互依賴的影響取決於與之相關的限制(constraints)或代價(costs)。所謂「需要有關各方付出代價的效應」,我們指的是引起後果的效應。他們可能會降低成本,提供收益,也可能增加成本。成本不一定是經濟性的,也可以指對他們的價值觀—如道德標準審美情趣、個人安全或生態一體化(ecological integrity)—產生重大影響。問題的基點在於,「需要有關各方付出代價的效應」是人們所關注的效應,這些效應反過來產生了關注和政治。(Keohane and Nye,1989:8)

相互依賴關係中付出代價的結果(costly effects)有可能是另一行為體直接或有意強加所致,相互依賴並不侷限於互利(mutual benefit)的情境,並不是以互利為特徵的。<sup>34</sup>衝突將以新的形式出現;無論軍事、政治或經濟、生態的相互依賴,都包括了合作與競爭,而不是完全「零和」,或完全「非零和」的遊戲;互利的相互依賴假定,該概念只適用於現代主義世界觀盛行的情形:幾乎不存在軍事威脅、衝突是低層次的。它似乎排除了彼此依賴的情形,如過去蘇美之間所形成的戰略相互依賴。而且,這種定義難以說明工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否存在相互依賴。由於相互依賴限制自主權,相互依賴關係總是與代價相關,沒有任何事物能夠保證我們所說的相互依賴關係以互利為特徵(Keohane and Nye,1989:8)。

正因為相互依賴並不一定導致合作,更顯出合作的必要。合作並不意味著不存在利益衝突,而是可以通過國際制度的政策調整來積極處理衝突,從而實現合作。基歐漢認為,由於國際合作是可能的,因此各國在關心各自的收益,強調的不是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即自己所得是否多於別人所得,而是絕對收益(absolute gain),即在合作中自己是否有所收益,不在乎自己的收益比別人多還是少。在基歐漢看來,近十幾年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在美國霸權衰落過程中仍然在發展這一現

---

<sup>34</sup>理論上,相互依賴有正向的或積極的,也有反向的或消極的,如果A國的某種變化在B國引起同樣性質的反映,即對A有利的對B也有利,對A有害的對B也有害,這種相互依賴就是正向的或積極的;相反,如果相互依賴關係中的某種變化對A有利,對B卻不利,或對A不利,對B卻有利,這種相互依賴就是反向的或消極的。很強的積極的相互依賴將導致相互的團結乃至國際整合:很強的消極相互依賴則會助長矛盾和衝突,甚至導致戰爭。

實表明，國際合作可以在沒有霸權的情況下實現。因此，他認為，世界政治的「制度化」將對各國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國家決策和行為只有通過分析國際制度下的合作與紛爭模式，才能準確加以界定和評估。基歐漢：「儘管國際合作不是 21 世紀人類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充分條件，但卻是一項必要條件。」(Keohane, 1998:84-86)

## 貳、權力與相互依賴的關係

基歐漢和奈在相互依賴概念上的重大貢獻在於，源於對國家之間財富和權力不平衡分配的強調，他們集中關注相互依賴的非對稱程度<sup>35</sup>，強調權力在相互依賴中的作用，在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係中，較少依賴的行為者可以藉由使用此種互賴關係作為在議題議價或者影響其它議題的一個權力來源(Koehane and Nye, 1989:10-11)。赫希曼(Hirschman,1945)的專著《國家實力與外貿結構》和華爾茲(Waltz,1970:205-220)的文章《國家相互依賴的神話》都明確指出，非對稱相互依賴是一種權力之源。也因為有不對稱的互賴關係的存在，權力的運作才更具有分析的意義。

為了理解權力在相互依賴中的作用，基歐漢和奈進一步的區分相互依賴的兩個變量：敏感性(sensitivity)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敏感性指在一個政策框架(policy framework)內的反應程度，亦即一個國家發生變化導致對其他國家造成高代價的改變(costly changes)的速度有多快，並且此高代價的影響有多大。(Keohane and Nye,1989:12)。敏感性測量的是一個行為環境的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其他行為體，這表示，個體行為體面對的結果是被集體控制的；脆弱性測量的是行為體終止一種關係需要付出的代價。當這兩個因素都處於高度不平衡的狀態時，就出現依賴現象。

敏感性相互依賴存在的一個例證是，1970 年代發生的石油價格上漲對美國、日本和西歐的影響。這些國家之間的敏感性就體現在進口石油價格的上漲和石油進口占總需求量的份額上。美國在石油價格的上漲方面的敏感性小於日本，因為

<sup>35</sup> 在一個相互依賴關係下，假設 A 國對 B 國的依賴，大於 B 國對 A 國的依賴，則此關係是一種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係(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反之，A B 兩個國家，假如 A 國的某種變化（如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伴隨著 B 國的某重可預見的變化（如同樣的物價水平的變化），則可以說這兩個國家是相互依賴的。如 B 國的某種變化在 A 國造成的影響同 A 國對 B 國的影響一樣大，那麼可以稱它們的相互依賴是對稱的，就是一種對稱的相互依賴(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石油進口在其總需求量所占的份額較小。然而，價格暴漲和加油站前排起的長隊表明，美國對外部變化確實存在敏感性。敏感性相互依賴的另一個例證是，1971年8月15日以前的國際貨幣狀況。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規則對參與各國政策構成了一定的限制，歐洲各國政府對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存在敏感性，而美國對歐洲各國是否要求把美元兌換成黃金的決定也存在敏感性。(Keohane and Nye,1989:12)。然而，如果相互依賴只包含敏感性，那麼就會忽略彼此依賴關係中最為重要的政治側面。相互依賴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就是脆弱性。基歐漢和奈認為，除了受外在影響而產生的敏感性外，還必須將政策框架的變化考慮在內。「當政策框架能夠改變時，情況會變得如何？」如果存在更多的選擇，如果制定新的或完全不同的政策是可能的，針對外部變化進行調整的代價是什麼？以石油進口為例，不僅石油進口占某國石油消費總量的比重頗為重要，進口其他能源的選擇和尋求替代選擇的代價也同樣重要。石油進口占其總需求量35%的兩國似乎對石油價格的上漲同樣敏感，但如果其中一個國家可以付出適中的代價轉向國內資源，而另一個國家沒有這種替代選擇，那麼後者的脆弱性大於前者。相互依賴的脆弱性程度取決於各行為體獲得替代選擇的相對能力及其付出的代價。(Keohane and Nye,2001:13)

20世紀60年代末，在布雷頓森林貨幣機制中，美國和英國對國外投機商或中央銀行將美元或英鎊兌換為財產的決定非常敏感，但是，美國的脆弱性小於英國，因為它可以選擇在可承受的代價內改變貨幣體系的規則。美國的潛在能力降低了自身的脆弱性，也使得自身的敏感性在政治上不那麼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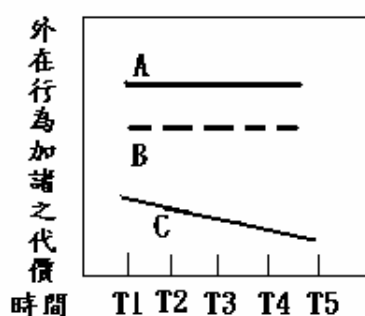


圖2-1 三個國家的敏感性  
(假設政策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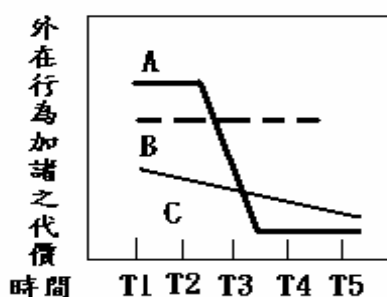


圖2-2 三個國家的敏感性  
(假設政策已改變)

資料來源: Keohane and Nye(1989:14)

就依賴的代價而言，敏感性指的是在試圖改變局面而做出變化之前受外部強加代價影響的程度。脆弱性可以定義為行為體因外部事件強加的代價而遭受損失的程度。讓我們以圖為例，說明它們之間的區別。我們假設三個國家同時面臨外部事件的影響，需要付出某些代價——例如，當石油生產國提高石油價格時，石油消費國面臨的困境。

圖 2-1 表示三國面對外部變化強加的代價所具有的敏感性。起初，A 國對變化的敏感性高於 B 國，還高於 C 國。隨著時間的推移，C 國的敏感性降低，儘管其政策沒有發生任何變更。這種變化也許是 C 國價格的提升導致的，價格的提高引起石油消費的逐步減少，從而帶動石油進口的回落。每一個國家在這段時間內總的敏感性由各自線下的區域來表示。

現在，假設每一個國家都試圖改變政策來降低外部行為所強加的代價。仍以石油進口為例，所謂改變政策，包括決定使國內承受高昂的代價：實行配給制度，或不惜成本開發本國能源。這些國家所承受的代價及其政治意願或許就是脆弱性的衡量標準。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其脆弱性主要源自資源匱乏，付出巨大代價在所難免。而對美國這樣的國家而言，自然資源的脆弱性還沒有那麼大。但是，由於政策變化受到國內社會政治因素的制約，脆弱性也可能來源於後者。例如，美國試圖在 1973 年之後實行新的能源政策，但由於國內缺乏共識而進展緩慢。

圖 2-2 表示脆弱性。我們可以說，A 國的脆弱性還小於其敏感性。A 國在第二個時段之初就改變了政策；在第三個時段，外部變化所施加的代價幾乎降至零點。A 國脆弱性的降低表明，該國採取了行之有效的政策，在石油消費方面實際上或潛在地達到了自給自足。例如，該國政府開發出了一種新的能源。而對於 B 國和 C 國而言，通過政策變化改變自己處境的能力不足，對外部事件施加的代價仍然存在脆弱性。

因此，在首次外在事件發生時的各國敏感性依賴程度是不同於同一時間內各國的脆弱性依賴程度，亦即起初一國的敏感性依賴程度高，並不意味著其脆弱性依賴的程度也高。對於外在環境改變所造成的立即影響的衡量並無法說明長期敏感性，也就是說一開始國家所反應的敏感性程度高低並不意味著未來也是如此。例如 C 國的敏感性就隨著時間經過而不斷的減少，因而初期敏感性也就更不能用來衡量長期的脆弱性，因為脆弱性衡量是決定於政治意志、政府能力、以及資源能力這三者。例如在前述的例子中，雖然 A 國的敏感性大於 B 國，但脆弱性卻遠

低於 B 國。

在外部事件施加代價之初，三個國家的敏感性相互依賴與其脆弱性相互依賴並不同。衡量外部變化導致近期影響的標準難以精確地指出長期的敏感性(我們注意到 C 國的敏感性隨著事件的推移自然下降)。但是，長期脆弱性的衡量更不精確，因為後者有賴於政治意願、政府能力和資源能力。以上事例表明，儘管 A 國的敏感性大於 B 國，但其脆弱性還小於後者。<sup>36</sup>

就理解相互依賴關係的政治結構而言，脆弱性尤其重要，它代表著一種成本的增加。在分析所謂的 1973 年之後的權力轉移的原料政治時，脆弱性顯然比敏感性更為重要。原料進口比例高往往被視為脆弱性高的指標，而它只不過表明敏感性可能比較高罷了。確定脆弱性的關鍵問題在於，新改變的政策如何有效地提供充足的原料或原料替代，達到該目標的代價是什麼。脆弱性既適用於社會政治關係，也適用於政治經濟關係。各國社會對 20 世紀 60 年代末跨國激進運動的脆弱性，取決於它們調整國家政策應對變革、減少動亂損失的能力。脆弱性相互依賴包含戰略意義，而敏感性相互依賴恰恰缺少這一點。但這並不意味著敏感性在政治上是不重要的。敏感性的迅速上升往往導致對相互依賴的抱怨以及改變相互依賴現狀的政治努力，那些實行多元政治制度的國家尤其如此。而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分析家則在做出戰略決定時，必須研究脆弱性相互依賴的基本模式。他們能做什麼？代價是什麼？其他行為體會做出怎樣的回應？其代價如何？儘管敏感性相互依賴的模式可以解釋困難之所在，但連貫的政策必須建立在對現有或潛在脆弱性的分析基礎之上。基歐漢和奈認為：如果忽視脆弱性基本模式，操縱非對稱敏感性相互依賴的努力有可能徒勞無功。

基歐漢和奈強調「敏感性」和「脆弱性」是相互依賴的根本特點。他倆還認為，戰後國際社會中國家間和超國家關係的發展促使人們更加注重研究對國家層次的諸角色的研究，注重對超越國界的國際組織相互聯繫和相互依賴的研究。據此，麥卡拉克(1979)發現國家間交往關係的發展從初期的多元交流到交往模式的定型，共可區分為三個階段的進程：第一個階段為發動期，國家依據國際體系的變化與國家利益的考量，企圖透過民間層次、政府層次與菁英層次的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來開拓雙邊進行實質交往的準備，並在這個階段進行初步的文化、經濟與

---

<sup>36</sup> 本節所舉的例子都來自 Keohane and Nye(1989:12-28)。



社會的交流，以增進雙邊的認識。第二階段是為互賴期，在這個時期國家間雙邊關係的互動已反應在決策的過程當中。其中，在互賴初期，雙方仍基於互惠的原則進行實質的經貿交往，此時雙邊的交往政策仍是充滿善意的，是為奈伊等人所謂的敏感性互賴階段。但進入互賴的後期時，國家間的交往由於政策間交互作用的日益加深，造成了兩種的發展關係。一為脆弱性互賴關係，因為對於互賴關係過於樂觀，而忽略了國際體系的轉變以及交往國的國力變化，過早進行政治化的過程，加上紛爭控制機制的未完全建立，使得雙方的信心不足，終造成國力等級較低的國家向等級較高的國家傾斜，倘若，在信心機制仍未建立之時，國家間的交往持續深化，將造成依賴型發展的局面；但若放緩交流的脚步，雙邊關係亦可能溢回敏感性互賴的階段。另一則為合作性的互賴關係(cooperation interdependence)，所謂合作性的互賴強調雙方充分地瞭解到政策改變所必須承擔的國內與國外的代價下，利用外溢效果的漸進方式，逐漸加強雙邊進一步的經貿合作關係，等到雙方完全信任之後，再透過政治化的效果，進行實質的政策交流與政經合作。而當國家間關係處於脆弱性互賴階段時，能即時建立信心機制，並有效的控制紛爭的程度，亦有可能將互賴傾斜調整至合作性互賴的關係。不過，雙方的衝突達到不能控制的時候，合作性關係亦可能變成脆弱性的關係。總之，在這個階段，正是國家間調整對外政策的關鍵期，其所遭遇到的壓力與可能付出的代價亦是相當高的。因此，在進行政治化的過程時，互信機制的建立是相當重要的。最後是成熟期，該階段將國家間的發展區分為兩型，其一是依賴型關係，另一是整合型關係。所謂依賴型，是為國家間的互賴傾斜持續深化，而在這種不利的情勢下，國力等級較低的國家往往會嘗試封閉自己的發展系統，阻絕對外接觸，以避免資源的不斷消耗，但如此行為猶如飲鴆止渴，反而使資源耗竭，加速國家的崩解；而整合型的發展，則主要在於合作性關係的深化，以及對合作關係的制度化與體制化之需求，加速政治化與紛爭解決效果的發生，進一步達到形成「聯盟」或「共同體」的模式產生。(林大鈞，2003：3-8)

由以上的分析得知：與其他那些持肯定性和平均主義論調的具有多元化傾向的學者形成對照的是，基歐漢和奈強調國家間財富和權力的分配具有不平衡性。因此，他們著力分析了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即國家是如何對經濟現象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和庫柏的假說(Cooper,1975:366-377)一樣，他們斷言這裡的問題並不涉及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份額，而是涉及他們各自的政策是如何為

其他國家的價格和收入因素的變化及其政策性要素所左右的。

在《權利與相互依賴》一書中，基歐漢和奈明確說明了現實主義假設可以充分解釋世界政治的條件，但需要更為複雜的變遷模式予以補充的條件。他們的目標並非拋棄現實主義理論的洞見，而是批判現實主義的理想模式，進而提出新研究綱領的構想，建構一個更為寬泛的理論框架：既將現實主義者對權力結構的關注包括在內，同時也可以對國際系統進程的變遷提出解釋。

基歐漢和奈對於這個理論演變的貢獻在於，他們將有關的敏感性問題與誰更容易受到國際體系制度規則變化之影響，這樣一個具有現實主義性質的問題融合了起來(Waltz, 1970:216-220)。即用相互依賴概念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結合起來，具有重要的理論整合意義。基歐漢指出，國際制度可以向成員國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信息交流的渠道，從而解決信息的不確定性問題，推動國際合作的發展。在基歐漢看來，國際制度的作用除了表現為提供更為完善的信息，減少不確定性外，還表現為降低交易成本，使承諾更具可信性，從而促進互惠合作。(Keohane, 1998:94-96)因此，當避免相互依賴所導致的後果的代價過於昂貴時，「建構一套聯合決策程序，進行互賴管理就似乎成了更為理性的選擇(Keohane and Nye, 1975: 374)。」

### 第三節 複合相互依賴

在《權力與相互依存》這部經典著作中，基歐漢和奈不僅剖析了權力和相互依存的關係，還提出了「複合相互依賴」的分析模式，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創新。複合相互依賴是一種理想模式，在 20 世紀 70 年代提出複合相互依賴的概念時，它是世界政治的部分特徵<sup>37</sup>。斯坦利·霍夫曼對此曾給予很高評價，認為權力與相互依賴的結合，複合相互依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提出，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在 70 年代末的最突出的新發展。(倪世雄，2003:205)

根據基歐漢和奈自己的陳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政治現實主義佔據著主導地位，但其假設作為分析相互依賴政治的基礎卻常常捉襟見肘。冷戰之後，

---

<sup>37</sup> 基歐漢和奈並不認為複合相互依賴完全忠實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現實。恰恰相反的是，複合相互依賴與現實主義的觀點一樣，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數世界政治的實際情況往往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參見 Keohane and Nye(1989:24)。

人們發現當冷戰時期的國家安全威脅逐漸減少時，外國經濟競爭和本國分配的衝突逐漸興起：利益的衝突能夠透過互賴來降低，而惟有國際合作能夠解決世界問題。於是國際關係典範正逐漸醞釀轉移當中，典範轉移的驅力(drive)主要是來自於國際結構兩個層次的流動(displacement)所引發：第一個層次是國際經濟體系的互賴所牽動的水平式流動(horizontal displacement)。在這個範圍中，國家間的交往模式深受彼此間政策架構(policy framework)的敏感性(sensitivity)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影響，因此，國家的產業競爭力、市場規模與經濟政策結構的強弱便成為依賴與互賴模型的重要評估指標。基歐漢和奈所設計的複合相互依存模式是對現實主義三假設的顛倒。他們批駁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並設想出一個完全相反的理想模式(ideal type)：非國家行為體直接參與世界政治，各問題之間不存在明確的等級區分，而武力並非有效的政策工具。這就是複合相互依賴的本質特徵。並認為複合互賴與國際合作的關係可以相輔相成，當前世界政經體系中，並非必然由傳統的國家角色去參與世界政治，具體地說，複合相互依賴的理想模是包含如下核心內容：(Keohane and Nye,2001:24-29)

### 壹、社會之間的多渠道聯繫(multiple channels)

多元溝通管道是 Keohane 和 Nye 所提出之複合互賴理論中重要的觀點之一。由於國際社會之互動日益頻繁與便捷，因此形成了國際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依存的現象。在此一現象之下，主權國家不再是國際體系中唯一的行為者，非國家行為者包括：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等等，都將得以更直接的參與國際事務，這些渠道可以概括為國家間聯繫、跨政府聯繫和跨國聯繫。

這些行為體的重要性，不僅源於它們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也因為它們承擔著傳送帶的功能，使各國政府對彼此的政策更為敏感。隨著政府國內行為範圍的擴展，公司、銀行以及工會做出的決定具有跨越國界的影響力，各國國內政策對彼此的影響越來越大。跨國交往增強著這種效應。因此，相比過去而言，每個國家彼此之間對其他國家的政策影響更加敏感，對外經濟政策與國內經濟活動的聯繫越來越廣泛，國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與對外政策相關的問題則越來越多。環境治理與技術控制問題同步發展，增進了該趨勢。

## 貳、議題間缺乏層級(absence of hierarchy among issues)

問題之間沒有等級之分意味著所有問題都附屬於軍事安全的時代不復存在。各項議題之間的層級越加模糊，許多原先不相關的議題產生了複雜的聯結關係。如此一來，議題的處理也可能不再是單一國家能夠獨立解決，在必要的時候，不僅需要其他國家的協助，甚至可能需要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共同協力解決。所以議題之間的相互聯結，不僅使得在研究國際議題上必須跨越層次，更因此提供了非國家行為者參與國際事務的管道與機會。外交事務的議程變得更廣泛和多面向，正如季辛吉曾言：「在應對傳統議程方面取得的進展已經不能滿足要求。一類前所未有的新問題被凸顯出來。能源、資源、環境、人口以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問題已經與構成傳統外交議程的軍事安全、意識形態和領土爭端等問題並駕齊驅。(Kissinger,1975:199)」

許多問題由通常被視為國內政策的事務引起，而國內問題與對外問題的區別非常模糊。許多政府部門(並非僅僅外交部門)在不同層次上考慮這些問題。如果國家在這些問題上缺乏足夠的政策協調，必然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不同的問題導致不同的各政府內部聯盟及跨政府聯盟，並導致不同程度的衝突。

## 參、軍事角色的式微(minor role of military force)

對現實主義而言，軍事力量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權力資源。現實主義學者素有強調軍事力量在國際政治中作用的傳統。武力主導著其他實力方式，擁有武力優勢的國家將雄霸天下。如果每個國家面臨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sup>38</sup>都極其嚴峻，則由經濟和其他資源支撐著的軍事力量將成為最重要的權力之源。生存是任何國家的首要目標，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武力是確保生存的絕對必要手段。軍事力量始終是國家實力的核心組成部分。國家最終必須依賴自身資源，努力維持自己在系統中的相對地位，即使付出最高昂的經濟代價也在所不惜。自由

---

<sup>38</sup>在國際關係學門中，我們常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這個詞彙去說明國家與國家間的競爭關係，它的基本假設是：「我的不安全感，來自你的權力擴張；反過來說，你的恐懼感，也正是來自於我對於權力的追求與權力狀態的改變。」由於沒有人知道權力的極大值是什麼，所以國家會盡可能的去尋求國力的強大化，最具體而簡單的方式即是不斷提升軍事能力，而這種動作，也勢必引起對手相同的反應，於是兩者將陷入永無止境的軍備競賽。關於安全困境，尚可參閱 Oskamp (1971:225-259)。

主義的視角也檢視國家行為，但同時關注其他團體。對自由主義思想家而言，經濟動機與安全關注同等重要。在共和政體之間，由於合作的潛在領域再擴大，武力的作用在下降，而國家不在那麼強調在國際系統中的相對權力地位，軍事威脅確實變得不再重要。

「自封建時代結束以來，領土國家行為體一直在世界政治中佔據統治地位；隨著多國公司、跨國社會傳動和國際組織等非領土行為體的出現，領土國家的作用在減弱」(Keohane and Nye,1977:3)。「大國使用武力的代價越來越高昂，其原因有四：1.核升級的風險。2.貧弱國家人民的抵抗。3.經濟目標實現的不確定影響或可能的負面影響。4.反對使用武力導致人員傷亡的國內輿論。但我們也指出，第四個原因對專制或威權主義政府的影響甚微，我們警告道：捲入地區敵對的國家和非國家恐怖組織發現，與過去相比，它們更難以使用武力。這些相反趨勢對武力作用的最終影響是侵蝕了建立在軍事力基礎之上的等級系統(Keohane and Nye, 1977:228)。」即由於國家之間存在複合相互依賴聯繫，武力或武力威脅的作用已大不如前。

在複合互賴的國際格局裡，由於多元管道的接觸與議題無層級的特徵，各個問題的目標追求應該不同，而且問題之間的聯繫也不甚密切。使得國家目標不再具有獨特性，反而呈現出多樣性(variety)的特徵。每一個官僚機構將追求自身目標的達成；如果一個問題影響多個機構，這些機構會在此問題上達成妥協，但它們難以保持政策的持久不變。而且，跨國行為體將把不同的目標引入各類問題中。而這種國家目標多樣性的趨勢，也產生了以下四種獨特的政治過程，而這些政治過程透過談判將權力資源轉化為控制結果的權力。這個轉化過程總會減少或增加某些東西。複合相互依賴條件下的轉化與現實主義條件下的轉化當然不同，而我們對結果的預測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Keohane and Nye,2001:31-38)國家透過這四種政治性的過程，配合外交戰略的擬定與地緣政治的關係，來達到影響交往國決策的目的。茲述如下：

#### 一、聯結的策略(linkage strategies)

在複合相互依賴的條件下，問題領域不同，追求的目標不同，權力分配與相應的政治進程也各異。在傳統模式中，經濟實力或軍事實力強大的國家把自己在某些問題上的政策與其他國家在其他問題上的政策聯繫起來，從而獲得主導各類組織和問題的地位。但在複合相互依賴的條件下，這種相符情形出現的可能性變

小了。由於軍事力量的地位下降，軍事強國意識到，越來越難以運用總體的支配地位控制自己所處弱勢問題的結果，由於問題之間缺乏明確的等級之分，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減少了。其他國家甚至可利用特定議題之影響力策略，要求或取得和軍事等強權國家討價還價的機會。各國為了追求本身最大的利益，自然會以自身擁有的籌碼換取其它國家的妥協，因此處理問題時必須考慮更多的因素。

這種研究的基本觀點是，問題聯繫就像經濟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獲得更多的稀缺物品、交換更豐富物品的方式增加自身的效用。<sup>39</sup>

## 二、議程的設定(agenda setting)

複合相互依賴的第二個假設是，在諸多問題之間並不存在明確的等級之分，使議程形成和設定將變得更加重要且難以控制。傳統政治分析集中處理政治—軍事問題，而對議程形成的廣泛政治活動少有關注，認為議程的設置取決於如下因素：均勢的實際或預期變化，國家所感知的安全威脅等。其他問題只有在影響安全和軍事實力的情況下才會變得非常重要。在這些情況下，議程將嚴重受制於總體勢力均衡的考量。

然而，隨著世界政治行為體多元化及問題複雜性的增加，武力的效用下降，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的界限變得模糊：隨著複合相互依賴的條件接近於成熟，議程形成的政治也更為微妙和多樣化。在複合相互依賴的條件之下，經濟增長和感性相互依賴的增加產生了許多國內和國際問題，而議程設置將受到這些問題的影響，國家必須改變以往直接處理問題的模式，而置重點於問題處理優先順序的安排，如此方能更有效果地獲得優先議價的機會，並把更多曾被視為國內的問題納入了國際議程，各問題領域中權力資源分配的變化將對議程產生影響，例如 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石油生產國對跨國公司和石油消費國的影響力增加，極大地改變了政策議程，進而藉議程設定主導權的行使獲取利益。

## (三)、跨國與跨政府間的關係(transnational and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從全球主義的角度看，在複合相互依賴的政策中，經濟、環境和社會全球主義的程度高，而軍事全球主義的程度低。關於複合相互依賴的第三個假設—即各社會聯繫渠道的多元化，進一步模糊了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分。與現實主義的假定相反，政治聯盟伙伴並不必要局限於國界之內。現實情勢越接近於複合相

---

<sup>39</sup> 這方面的論述，可參閱 Tollison and Willett (1979:425-449)、Sebenius, (1983:281-316)。

互依賴的條件，跨國關係對政治談判結果的影響越大。多國公司既是獨立行為體，又是政府操縱的工具，其作用可能會越來越大。國內行為體與國外同行之間有組織的或沒有組織的交往，將對其態度和政治立場產生影響。

由於多層次的溝通管道，社會之間的接觸，將會使國內和國際政治的分別，變得更模糊，由於彼此之間的接觸增加，中央集權變得比較不容易。

1980年代中期，區域經濟主義(economic regionalism)或所謂的區域貿易協定(RTAs)於世界各地蔚為風潮，而此一趨勢對於世界經濟的發展具有相當重大的影響，是經濟全球化的具體作為。1986年，歐洲單一市場法(The European Single Market Act, 1986年)正式簽署，連帶推動其他類似方案的進展。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宣布：美國首先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亞太地區是美國根本利益所在。為此，美國調整了亞太戰略，積極發展與亞太國家的經濟合作。歐盟的經濟發展戰略已經走向「泛歐化」和洲際化。歐盟不僅通過協議保持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聯繫，還在1996年與亞洲國家建立了跨洲際的首腦會晤機制。中國也與非洲國家建立了「中非合作論壇」聯繫機制，並決定2010年與東盟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sup>40</sup>直至2005年初，全球約有近300個區域貿易協定，其中世貿組織的所有成員(日本、香港和南韓除外)，幾乎每一個成員都至少簽署一個以上區域協定。經濟關係已經成為當今國際關係的核心內容。

#### (四)、國際組織的角色(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由於多渠道聯繫的存在，國際組織將在世界政治中發揮迥然不同的重要作用。在現實主義觀點裡，由於國家以自我利益為主，戰爭的威脅，使得國際機構變成次要角色，但在一個多面向議題的實存世界裡，跨國和跨政府的聯盟形成，國際機構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不論是政府間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角色，在21世紀全球化過程，都日趨重要。

尤其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一些國際組織及超國家機構能夠運用各種國際機制介入各國政治，協調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以維護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謀求形成一種國際協商機制。這種協商機制的立足點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國際社會，

<sup>40</sup> 2002年11月4日中國與東協簽署(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於2010年完成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此自由貿易區一旦建立將擁有17億消費者，2兆美元的國內生產毛額，以及1.2兆美元的貿易總額，將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並且於2003年10月中國與東協亦簽署了(中國—東協戰略伙伴關係聯合宣言)，象徵著中共正以經濟帶動政治與安全，力圖將中國與東協貿易市場近一步的整合。

其權力特性表現出雙重性，即協商性與強制性。這種權力是在協調基礎上，以國際法、國際公約、國際協議等形式得到普遍認同，通過國際組織加以實施而發揮作用的。它的強制性雖尚不能同主權相提並論，但其約束力絕不可忽視。因此小國常常歡迎國際機制，將國際機制視為防止強國隨意濫用權力的屏障。美國等大國希望為隱定的國際環境創立規則，但卻無力支配它們。對大國而言，機制具有同等的價值。例如，最近數十年來，國際機制協助防止核擴散、限制貿易保護主義、重新安排開發中國家(LDCs)償還債務的時間表，從而促進了各國的利益。

綜上所述，複合相互依賴條件下的政治模式不同於現實主義對世界的認識，二者之間的區別請詳見表 2-1。基歐漢和奈認為：傳統理論無法解釋複合相互依賴條件下的國際機制變遷。但是，在接近現實主義條件的情境之下，傳統理論則是適用的。

表 2-1 現實主義和複合相互依賴條件之下的政治進程

	現實主義條件之下	複合相互依賴條件之
行為體的目標	軍事安全將是首要的國家目標	國家的目標因問題領域而異。跨政府政治的存在，導致目標難以確定。跨國行為體將追求自身的目標。
政府的政策工具	軍事力量是最為有效的政策工具，儘管也採用經濟手段及其他政策工具。	適用於具體問題領域的權力資源最為相關。相互依賴、國際組織和跨國行為體的管理將是主要的手段。
議程形成	勢力均衡的潛在轉變和安全威脅將確定高度政治領域的議程，並將對其他議程產生重大影響。	議程受到如下因素的影響：各問題領域內權力資源分配的變化；國際機制地位的變化；跨國行為體重要性的變化；與其他問題的聯繫以及敏感性相互依賴增強而導致的政治化等。
問題的聯繫	聯繫將降低問題領域間後果的差別，增強國際等級區分。	由於武力的效用難以發揮，強國實行聯繫戰略將愈加困難。弱國通過國際組織推行聯繫戰略將衰落而非增強國際等級區分。



國際組織的作用	受制於國家權力和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國際組織的作用有限。	國際組織將設置議程，促動聯盟的建立，並為弱國的政治活動提供場所。選擇處理某問題的組織論壇並爭取支持票的能力將是重要的政治資源。
---------	-----------------------------	---

資料來源： Koehane and Nye(2001:32)

#### 本研究整理

由於相互依賴的存在，國際機制起了重要的作用，相互依賴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國際機制的變遷。隨著相互依賴的加深，國家間關係的調控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重視，而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舞台上越來越活躍，現實主義以國家和權力為中心的理論範式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權力與相互依賴》出版後，國際關係學界發生了一場引人注目的變化，即學者們轉而更加關注與機制有關的理念。國際機制概念有所擴展，將國際安全問題的分析也包括在內。<sup>41</sup>

《權力與相互依賴》驗證了國際機制概念如何用於系統性的經驗主義分析，使得國際機制作為匯聚一系列規則、制度和實踐的描述性工具得到廣泛的應用。進一步說，它促進了理解機制變遷四種模式的發展<sup>42</sup>。在決定採用哪種或哪些分析模式之前，人們需要研究主宰其所想解剖的國際體系狀況的有關條件。且基歐漢和奈注意到，國家間財富和權力的分配具有不平衡性，相互依賴是非對稱的、高度政治性的，這種非對稱性造就了國家以及非國家行為體的權力資源，於是他們將誰更容易受到國際體系制度規則變化的影響這個具有現實主義性質的問題納入研究視野。實際上，基歐漢和奈認為，單獨或者聯合運用不同類型模式的可能性取決於具體的環境因素。通過揭示這樣的觀點，他們倡導了「一種區別對待世界政治範疇的不同層面和領域的獨特方式」(1977:29-59)，並由此試圖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開拓出一條中間道路。

基歐漢和奈的研究表明，當國家處於複合相互依賴的世界中，在解釋國際機制的變遷時，問題領域模式和國際組織模式更為有效。國際機制賦予國家進行合

<sup>41</sup> 有關這個領域的重要著作，可參見：Jervis (1983:173-194)、Stein(1985:599-627)、Smith (1987:253-282)。

<sup>42</sup> 這四種模式即經濟進程、世界的總體權力結構、各問題領域內的權力結構、受國際組織影響的權力能力等的變化。作者以較為簡單的模式最為起點，其後循序漸進增加複雜度，探究較為新穎的問題結構模式和國際組織模式。

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獲致共同收益；國際制度確實增加了互惠機會，使一國政府信守諾言，並督促他國也這樣做，即使強國也從遵守規則中獲益。

20世紀80年代，國際機制研究的重心從描述相互依賴和國際機制現象轉換向深入分析國家合作的條件。主權國家間的合作是如何發生的？國際制度又怎樣影響了它？相互依賴作為分析問題的實質性背景，一直是國際機制變遷研究的根本出發點之一。相互依賴也影響著國際機制的的作用，但國際機制不能超越國家主權和國際政治的現實，在相互依賴關係中，各方的依賴程度不一，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存在著非對稱性。因此，相互依賴對各方自主權的限制程度也是不一樣的。相互依賴的這一特點影響著國際機制的脆弱性。相互依賴意味著參與各方要付出代價。國際機制可以為這些代價提供某種程度的保證，各國在可以承受成本的範圍內也會接受相應的制度安排。但是，無政府狀態和國家利益的考慮是具有根本意義的。機制依賴於共享利益，從理論上講，即使最強大的國家，如當前的美國，也越來越依賴國際機制，但國際政治的現實表明，國際機制仍不過是權力鏈上新的一環。

基歐漢和奈通過對國際機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扮演的功能價值的分析，說明霸權國家主導建立的國際機制確保著國際合作與世界和平，國際機制對於促進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對於減少國際紛爭與不和是有價值的，對管理國際相互依賴是有意義的。

斯佩尼爾(Spanier,1993:582-584)以八個方面分析相互依賴對國際關係的影響，說明如下：

(一)、關於核子武器：正因為核武器具有毀滅性質，反而產生了更大的安全感。威脅因素既然已起作用，武力威脅本身就代替了無限制的暴力行為；武力被使用時，它受到一定的約束，以阻止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升級。這就造成了國際安全的相互依賴。

(二)、關於國家對外政策主要目標的變化：對大多數國家的人民來說，低級政治問題比高級政治<sup>43</sup>問題更為嚴重。他們迫切希望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因此，各國政府也就不得不越來越重視初級政治問題。

(三)、各國已無法自給自足、關閉自守：如果各國政府要滿足本國人民更加富

---

<sup>43</sup>低級政治是指經濟、社會、環保等領域的問題，高級政治是指軍事、國防、安全等領域的問題。

足的要求，它們將不得不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經濟。做不到這一點將會在政治上付出高昂的代價，經濟成長也將變得緩慢。由此，人們重新意識到各國在經濟上已是相互依賴，每個國家經濟的活力與繁榮，有賴於所有其他國家經濟的活力與繁榮。所有國家在經濟前景都無法擺脫地聯結在一起，國家之間無數的經濟紐帶形成了一個互相依賴網。

(四)、低級政治將導致合作，高級政治將引起衝突：各國在民生問題上變得如此互相依賴，以至於任何一個特定國家如欲促進其自身繁榮，除了合作之外，別無他途。在安全問題上，各國仍以獨立的政治單位在起作用。在新的社會經濟模式中，各國之間的關係是相互依存，共生共榮。

(五)、武力與低級政治問題之間基本上並無關聯：互相依賴的各個國家必順長期合作，武力的使用和武力威脅，在控制衝突時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合作的行為中則是無效的，甚至起反作用。武力是一種笨拙的武器，在社會經濟問題上使用是得不償失的。

(六)、權力的真正含義改變了：這是因為武力喪失了其作用，解決共同問題時需要採取合作的態度，互相依賴的原則成為處理外交事務的核心內容。

(七)、與「冷戰」和緩和的關係格局比較，國際關係格局是多極的：不管問題是石油還是其他資源，或是環境、人口、糧食、海外投資、跨國公司等等，都有許多國家捲入，並且通常是不同的國家參與不同的問題，國家的基本目標是福利的提升。

(八)、在互相依賴的世界裡，國家將依然存在，但目標已有所改變：真正平等的國家將在更高的和諧與互相理解之中一起生存，至少將使它們傾向於和平地解決衝突。經濟的和技術合作將越過國界。國家已不再能夠單獨勝任地解決它們自己的問題，滿足本國人民對更好的生活的要求。全球性的這些問題一如貧瘠的自然資源和能源、人口過剩、貧困和食物短缺等，只有在全球範圍內才能得以解決。一國單獨的解決方案已經再也無濟於事了。

與強調國際衝突和軍事安全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理論相比，相互依賴論在研究的主要問題、研究對象、國家關係、行為法則與形式、武力與權力的作用以及前景等方面都與之有著很大的區別，相互依賴的模式體現了一種與我們早先描述的截然不同的國際體系。斯佩尼爾(Spanier)並對舊的「權力政治模式」和新的「相互依賴模式」做了全面深入的比較分析。如圖 2-2 所示：

表 2-2 權力政治模式與相互依賴模式比較表

	權力政治模式	相互依賴模式
問題	高級政治：安全、均勢、勢力範圍	低級政治：自然資源、能源、糧食和人口、環境
行為者	國家(主要是第一和第二世界)	國家(主要是第一和第三世界)、跨國公司
國家關係	衝突的「國家利益」	相互依賴、共同利益和國際合作
法則	衝突：「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均勢)	合作：「相互依賴、榮辱與共」(建立共同體)
管理	雙邊	多邊
權力的作用	強制	報償
武力的作用	高	低
組織方式	等級制(兩極或多極)	更接近於平等主義
前景	基本不變	根本變化

資料來源：倪世雄(2003:437)

#### 第四節 經濟互賴與和平

二十世紀的歷史留給人類的一個最大教訓，乃戰爭是人類最大災難。無論目的與理由多麼冠冕堂皇，戰爭都是對自由、民主、人權之最大傷害。所以，戰爭與和平成為國際關係研究學者的永恆主題，成為無數國際關係學者畢其終生心血所奉獻的事業。他們探索衝突與合作的原因，揭示戰爭與和平的規律，希冀國際社會和國際社會中的成員能夠減弱、克服和超越衝突，能夠更加稱職地合作，找得共同的安全和幸福。國際關係學的不同理論和學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圍繞戰爭與和平的主題展開討論和進行研究的，它們之間的爭論也大多涉及合作與衝突的原因、內涵和意見(秦亞青，2002：1)。

##### 壹、自由主義對經濟互賴與和平的主張

對於經濟互賴與和平的關係，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自由主義流派對「貿易和平論」的論述最詳盡。自由主義的相互依賴模式認為，相互依賴尤其是經濟上的相互依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有利於避免國家間的衝突和戰爭，從而可以促進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因此，自由主義主要是在「經濟相互依賴促進和平」(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promotes peace)的意義上，論證相互依賴作為一種理想的世界秩序模式的合理性的，認為藉由彼此間的經濟互賴關係可以加強並促進國際和平關係的發展。

商業自由主義的捍衛者將古典經濟學家關於貿易的良善觀點引申到政治領域。自啟蒙時代以來，按照孟德斯鳩的說法，自由主義認為商業的自然影響是導致和平。兩個存在貿易關係的國家彼此依賴，如果一個國家有購買的利益，另一國則有出售的利益；所有的聯盟都基於相互需要(Hirschman,1977:80)。康德(1724-1804)在其名著「永久和平論」(1795)裡的揭示：經濟互賴為促進人類和平的支柱之一。兩國之間的經貿往返愈是熱絡，彼此的互賴程度就會提高，而戰爭等同摧毀此一聯繫，所失去與所沒有得到的經濟利益，也就是衝突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將因而陡增，所以一般而言自會有所節制(Goldstone,1999:7)。200多年前，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提出了勞動分工和相對優勢等古典經濟學論，人們對交換的經濟獲益理解甚深。恰如斯密和李嘉圖指出的，貿易使得具有不同稟賦的地區可以專門以事自己最擅長的經濟。人員和資本向高邊際效益區域的流動也促進了生產的提高。自由主義者常常強調的經濟相互依賴也可以帶來諸多收益。認為在兩國的生產結構呈現互補，或者跨國產業垂直分工格局日益完備的情況下，貿易的互惠互利本質更加凸顯，和平作為繁榮的前提也會倍受尊重。其次，經濟整合一旦啟動，本身的自發動能將帶來更多的交往(engagement)，而往更正式、更可預測的穩固關係邁進，甚至逐步形成利害與共的共同體(community)。

自由主義相信國家按照市場或近乎市場的規則進入國際社會，以獲取其他地方的資源。自由主義的批評者 Buzan，承認：「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經濟體系中，採用暴力追求經濟利益的成本將會超過其收益，因為參與者已經可以通過競爭獲得市場和資源(Buzan,1984:603)。」複雜的國際政治安排可以確保市場和資源的獲得，而前者可能為戰爭所摧毀。如果像亞當·斯密斯所教導我們的，市場規模限制了勞動分工，則國際秩序範圍將限制市場的規模。國家之間有價值的互動越複雜、相互依賴程度越深，則採取長期合作、避免打破這些紐帶的動機就越強烈。像其他社會關係一樣，在國際關係中，合作的動機取決於行為體是否「進入足夠稠密的互動網絡之中」以及它們從這些紐帶中獲益的程度(Hardin,1982:228)。這並不意味著商業必然導致和平；但是，我們有理由確信，成本、收益的核算將進入國家

決策之中，這一核算將受到打破這些獲益紐帶之成本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對這一觀點的分析性支持，自由主義者所信奉的是，開放、規則導向的國際體系提供了和平行為的動機。

自由主義認為，經濟相互依賴通過提高貿易相對於擴張的價值，可以降低戰爭的可能性。由於相互依賴的國家之間通過貿易比通過戰爭更能夠獲得各自的利益，因此，它們寧願進行貿易(trade)，也不願進行侵略(invade)。貿易可以為相互依賴的各方提供珍貴的收益，和平的貿易不僅使依賴國受益於緊密的聯繫，而且使他不必承擔任何戰爭的代價和風險，因此，相互依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有助於促使依賴國之間盡力尋求避免戰爭。自由主義者斷言，只要相互依賴的質量能夠維持很高的程度，那麼我們就有理由對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持樂觀主義態度。貿易預期理論(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也認為，當國家在目前高度依賴的貿易關係下，對未來的貿易利益趨向正面預期並且可以持續到未來，則貿易互賴才有助於和平(Copeland,1996:5-41)。

經濟相互依賴和平論的集大成者理查德·羅斯克蘭(Richard Rosecrance)結合核時代的國際政治最為全面地闡述了相互依賴模式的合理性。他認為，世界各國必須在關注通過商業並促進財富的「貿易國」(trading states)和對軍事擴張念念不忘的「主權國」(territorial states)之間做出抉擇。現代世界的條件促使貿易模式成為各國展的主導走向。不僅戰爭的代價過於高昂，而且通過和平的貿易選擇，「一個國家從貿易中獲得的收益，其他國家也可以同樣獲得」。因此，「在高度相互依賴的現代國際體系內，發動戰爭的動力已經不復存在了」。「貿易國知道，在世界市場的支持下，通過內部經濟發展比通過佔領和兼併大片土地更能獲益(Rosecrance,1989:48-57)」。

在很多人士看來，不論對利潤的追求是否會促使一國通過軍事擴張來開拓市場和投資場所，一旦有關國家相互間建立起了經濟聯繫，這種關係本身總是有利於和平的。它意味著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而戰爭會破壞這種關係，從而傷害以其為基礎的經濟利益。由於合作的潛在領域再擴大，武力的作用在下降，而國家不在那麼強調在國際系統中的相對權力地位，軍事威脅確實變得不再重要。安吉爾(Angell)就指出，「戰爭已經變成不可思議的東西，它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對立面，會破壞貿易的源泉，通過戰爭獲益實屬幻想。」(陳峰君，2004：41)

但在現實中，國家追求的並非樣樣是經濟價值，而且它也未必樣樣滿足於基

於既定的依賴關係的經濟好處。因此，顯然不可能將消除戰爭的希望完全寄託於所存在的相互依賴身上。不過，應該承認，相互依賴有其促進和平的一面。如果一種相互依賴關係正在給兩個國家帶來經濟收益，這是有利於和平的，因為它至少能讓一方在考慮針對對方的武力行為時三思而後行。而且，若一國有意發動對外戰爭，它需要考慮的不是該行為對與交戰國的經濟聯繫的影響，還包括對與那些並未直接捲入戰爭的國家的經濟關係的影響，因為戰爭可能會危及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隨著相互依賴和全球主義程度越來越強，網路之間的相互聯繫會更多，結果，「系統效應」(system effects)變得更加重要。如果相互依賴程度是較高的，有關國家需要對其間復原的經濟交往過程加以合作式管理，以儘量避免這一局面中的種種的不確定性可能造成的風險。這就可能意味著國家間更強的合作氛圍和理解精神，貿易、金融領域的雙邊、地區性和全球性安排的建立和完善也可能提高各國對國際經濟前景的預期，從而降低戰爭的吸引力。(陳峰君，2004：42)此外，自由主義認為，經濟相互依賴有助於培養不同國民之間日益增加的相互理解，從而減少因誤解而導致戰爭的可能性。在自由主義學者看來，貿易具有「外溢」(spill-over)效果，經濟貿易的功能性領域的相互依賴可以擴展到政治領域，增加貿易伙伴的政治聯繫，從而改善長期合作的前景。因此，相互依賴中的國家更趨向於避免戰爭，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更能夠維持和推動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潘忠岐，2004：299)

## 貳、現實主義對經濟互賴與和平的主張

對於自由主義者的互賴和平主張，現實主義則持相反的論點，認為互賴關係無法促進國家間的和平，反而增加國家間衝突與戰爭的機會。對現實主義者而言，對國家行為的限制主要源自其他國家的實力，國際政治是爭奪權力的鬥爭，在這一點上與其他政治並無二致；但國際政治鬥爭由有組織暴力主導，在這一點上有別於國內政治。戰後影響力最大的一本國際政治教科書這樣寫道：「人類全部歷史表明，參與國際政治的國家都在不斷準備或積極介入以戰爭形式出現的有組織的暴力，或從中恢復過來(Morgenthau,1967:36)。」以下三個假設構成了現實主義的基本觀點：其一，作為整體的國家是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行為體，這是一個帶有雙重涵意的假設，即國家是最重要的行為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單位行事；其次，現實主義假定，武力是一種可用且有效的政策工具，儘管其他工具也可以採

用，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卻是行使權力的最有效工具；其三，部分與第二個假設相關，現實主義假設世界政治中的問題(issues)有等級之分，其中軍事安全最為重要：作為「高級政治」(high politics)，軍事安全主導著經濟和社會事務等低級政治(low politics)。(Koehane and Nye,2001:24)

這些現實主義的假設構成了關於世界政治的一種理想模式。從這些假設中，我們可以推導出一個具有如下政治特徵的世界：國家之間存在著現實的或潛在的衝突，國家隨時都有可能動用武力。每一個國家都力圖保衛自己的疆土和利益免受現實威脅或潛在的威脅。國家之間的政治一體化微不足道，而且只有符合最強大國家利益的時候才有可能存在下去。跨國行為體或者不存在，或者在政治上無足輕重。國家的生存，端視其能否明智地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國際政治體系的穩定，端視政治家能否成功地調整其利益追求，建立行之有效的勢力均衡。(Koehane and Nye,2001:25)

世界政治缺少共同的政府，在這個領域內，各國必須捍衛自己，否則將面臨滅亡之虞。自助的必要，要求各國採取競爭性努力來增進自己的安全，這就造就了「安全困境」，即「一個國家試圖增進其安全的種種手段導致了他國安全減少」的情勢(Jervis,1978:169)對現實主義而言，現代政治的外在限制主要是通過政治——軍事競爭乃至威脅來運行的。

帶有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或與經濟民族主義<sup>44</sup>相呼應的現實主義者，對貿易和平論所隱含的「積極開放」寓意最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緊密的貿易關係具有風險。特別是在經濟規模大小懸殊或兩造「不對稱依賴」的情況下，比較依賴的一方在經濟上是脆弱的(vulnerable)，因為貿易萬一突然中斷必須負擔巨大的「調整成本」，比如說原先的貿易伙伴之間發生戰爭與經濟制裁(特定物資禁運或貿易路線之封鎖)。換句話說，如果雙方之間出現這種支配性的權力關係，貿易不僅無助於和平，甚至往往成為潛在衝突的來源。退一步言，即使貿易(分工與交換)蘊藏經濟利益，或有助於「穩定」局面的維持，那也是因為互賴關係中較依賴的一方已經對「霸權」付出「順從」的政治代價。(洪財隆，2005：2-4)即現實主義學者提及了依賴

---

<sup>44</sup> 該學派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實踐如日益擴大，有可能在人口迅速增長、面臨嚴重窘境的國家造就這樣的感覺：或接受生活水準下降的悲慘前景(至少放棄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或者尋求通過征服控制更多的領土、更多的資源、更大的市場和供應地。這導致了如下一般性結論：一旦控制世界實質性資源的重要大國拒絕推行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關係，它們就會播下動亂和戰爭的種子。特別是，它們造就了資本主義的強大動力。帝國主義野心就被賦予部分正名，使其宣傳有著令人炫目的基礎。可參見 Staley(1939: 103-110)。



關係所產生的槓桿作用，即一國可能以他國對自己的經濟依賴為槓桿，來進行控制和支配。由於經濟相互依賴常常是不對等的，一方對另一方的依賴可能大於或小於後者對自己的依賴，這樣，槓桿作用就有了更大的空間。如以依賴關係為籌碼，就有關係緊張乃至武力衝突的可能，尤其是再相互依賴不對稱的情形下。因此只有維持權力的平衡，才是和平的維持之道。

摩根索(Morgenthau,1948)在《國家間的政治：為權力與和平的鬥爭》認為，他不認為貿易正再使世界進入一種社會化格局。儘管他了解多世紀以來的傳統說法，即緊密的貿易聯繫將使世界擺脫無政府狀態和戰爭，但摩根索還是堅信國際貿易更是國際衝突的來源。至於工業和科技，摩根索認為它們只是必要時國家用以進行戰爭的權力來源和使用工具。摩根索的觀點與重商主義者，或經濟國家主義者有異曲同工之處。

華爾茲在1979年出版了他的《國際政治理論》(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新現實主義著作，試圖證明所謂積極的相互依賴關係有利於世界的觀念不過是一種幻想。他認識到世界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各國在某種程度上相互依賴，但他認為這種相互依賴在本質上是消極的。也就是說國家間相互存在的脆弱性使得各國很容易在經濟上相互傷害。更糟的是，這種脆弱性還是不平等的，使得經濟權力集中在一部分國家手裡。華爾茲據此得出結論，指責自由主義者宣稱的國際相互依賴不斷加深和緊密，以及國際相互依賴關係是一種積極的關係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相互依賴雖引發了國際合作的願望，但只能使各行為體的關係加深，是否能夠達成合作與和平還要考慮諸因素的博弈結果。

華爾茲指出，一次大戰以前，國際貿易的相互依賴處在很高的水平上，主要強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0%到50%都來自對外貿易，而到了70年代，這一數字則下降到了8%到15%。華爾茲質問道，如果如同自由主義者和跨國主義者聲稱的，貿易的相互依賴關係是積極的，那為什麼第一世界大戰中，德國還會和俄國(它最好的貿易伙伴)，英國(它第二大貿易伙伴)和法國(它第三大貿易伙伴)進行戰爭呢？一戰的爆發證明了經濟相互依賴並不能使現代工業社會免於戰火。(漢得森，2004：236)

吉爾平(Robert Gilpin)指出，相互依賴的含義並不侷限於互利(mutual benefit)的情形，並不是以互利為特徵的。相互依賴關係的代價和收益的核心是如何分配收益，追求最大限度的收益是行為體的本質特徵，相互依賴並不一定導致合作，

遑論促進和平。高度的相互依賴也可能給合作造成新的困難。在相互依賴日益上升的狀況下，行為者遭遇的是和他方之間日益增加的不確定性、易受侵犯性以及越來越複雜的社會環境。對於系統狀態的已有了解，越來越不需要。結果，行為者不得不更經常地採取「試錯」行為，誤解和衝突的危險將隨之上升。

現實主義談經濟相互依賴最精闢的地方應在於，全球化下經貿相互依存的程度固然日益加深，卻也為作為技術來源與擁有廣大消費市場的大國，提供了一個藉由經濟手段牟取政治利益的管道，尤其是透過小國的「國內政治」作為發揮影響力的方式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更是尖銳。因而認為經濟互賴不僅無法促進和平，也會提高戰爭的可能性。

### 參、互賴理論對經濟互賴與和平的主張

關於經濟互賴與和平，基歐漢和奈曾明確指出：「我們並不認為，當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國際衝突就會消失的無影無蹤。相反地，國際衝突會以新的形式出現，甚至會呈現新的態勢。」(Koehane and Nye,2001:9)他們也意識到國家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可能是不對等的，一些國家可能比另一些國家更脆弱、更具依賴性。他們也承認在利益分配基礎上的相互依賴可能產生尖銳的競爭。

但基歐漢和奈也認為，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的一個好處是阻止和延緩戰爭，因為國家不願意能夠為其帶來價值的貿易被中斷。相互依賴(尤其是複合相互依賴)使大國使用武力的代價越來越高昂，其原因有四：一、核升級的風險。二、貧弱國家人民的抵抗。三、經濟目標實現的不確定影響或可能的負面影響。四、反對使用武力導致人員傷亡的國內輿論。但他們也指出，第四個原因對專制或威權主義政府的影響甚微，但與過去相比，它們更難以使用武力。這些相反趨勢對武力作用的最終影響是侵蝕了建立在軍事力基礎之上的等級系統(Koehane and Nye, 1977:228)。

基歐漢和奈關於武力使用受到限制的觀點，構成了分析經濟相互依賴政治的基礎。該分析包含三個基本主題，基歐漢和奈並未對三者進行明確的區分：

- 1.利用對價還價理論，對相互依賴政治進行以權力為導向的分析  
(power-oriented analysis)；
- 2.分析複合相互依賴的理想模式及複合相互依賴對進程的影響；
- 3.嘗試解釋國際機制：對相互依賴關係產生影響的一系列控制安排(Koehane

and Nye ,1989:19)。

基歐漢和奈接受商業自由主義的看法，即經濟的開放會產生有利於和平而不是有利於擴張征服的激勵因素。但經濟相互依賴只是和平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能不能產生和平，最終取決於國際制度的效用，貿易擴展導致的國際相互依賴對國際和平是重要的，但僅由此並不必然帶來和平，還應該通過國際制度的力量，使相互依賴關係處於一種制度化的模式中

互賴理論的基本理論主張是：國際社會處在無政府狀態，但國際社會並非無序，而是有一定的組織形式和行為規範；國家是自私、理性的行為體，其目的是追求絕對收益；國家之間存在利益的衝突，但各國為了求得自己的利益而尋求合作，所以互惠合作是國家之間博弈的結果；為達到絕對收益的目的，國家要尋求一種有效的機制，而取得集體的最佳結果，而國際機制是保證國際合作的有效途徑。其基本機制理論主張是：國家是追求絕對收益的理性自我主義者，只關心自己的得失，承認權力在國際機制中的作用，但認為國際機制是國際關係中的獨立變量，強調國際機制在幫助國家實現共同利益中的重大作用；活躍在特定問題領域的國家有只能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國際機制形成的理論核心，世界政治存在著廣泛的不確定性。國際正式通過降低不確定性來促進國際合作的。互賴理論用相互依賴概念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結合起來，具有重要的理論整合意義，之間的關係如圖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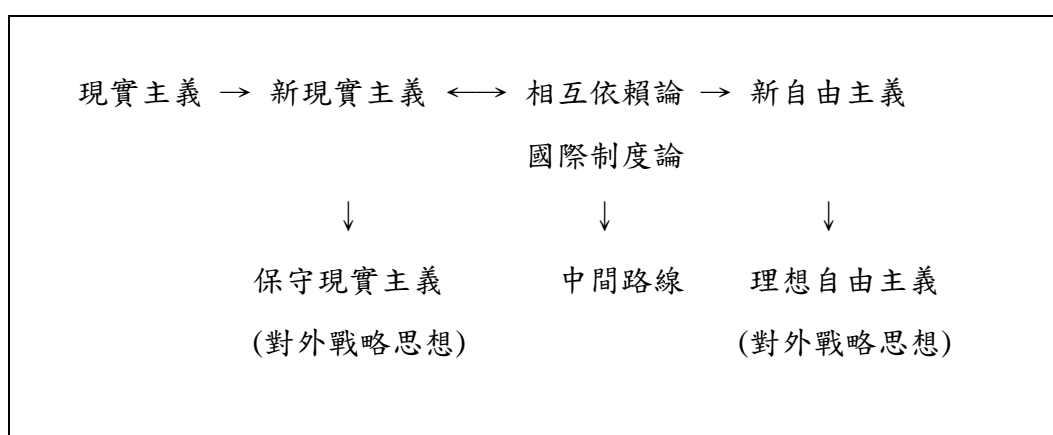


圖 2-3 當代主要國際關係學派關係

資料來源:倪世雄(2003:221)

一般而言，經濟相互依賴有利於促使世界擺脫以軍事安全和戰略為國家重點任務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儘管今天國際社會的發展還充滿者不確定性，現實世界是合作態勢日益強大，但貿易衝突仍然時有發生。通過經濟的相互依賴而產生的互動通常使聯繫更為緊密，但相互依賴有時也意味著不對等的依賴性和脆弱性。真實的世界，實際上處於以權力衝突為核心的現實主義觀點和以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為特點的世界主義觀點之間。

對主要國家來說，全球貿易已經使國家安全不再是各國最關心的問題。大多數觀察家可能都會同意，生產與分享全球財富的衝突和競爭比超級大國聯盟和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要健康得多。同樣，一些國家為達到貿易平衡威脅實施關稅報復雖亦存在，但多邊會談和貿易體制作為解決問題的層次還是佔有牢固的地位。國際經濟相互依賴的諸多領域處於成長之中，變得更加廣泛。

我們可以借用整合理論的許多真知灼見對此加以分析。關於跨國關係和相互依賴的初步研究，拓寬了對國家利益如何學習和變遷的認識。目前只有歐洲具有國際共同體的某些特點。對西歐來說，互動最積極的相互依賴，它使歐盟成員國之間偶爾的摩擦顯得無足輕重。歐盟有幫助所有成員國克服不平等，達到更高經濟水平的再分配措施。最後，西歐的解決問題層次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它建立在二十五個獨立主權國家間高度的政治整合基礎之上。我們可以預期未來會有更積極的社會和共同體的發展，不同的文化和政府可以再一個高度一致的共同發展的目標下執行同一個複雜的任務。(漢得森，2004:249)

#### 肆、簡要評述

互賴思想的理論貢獻在於，它完全是以最近的歷史和邏輯分析為基礎，而不是基於對國際政治中具體歷史事例的深度分析。有時相互依賴被描述成國家間或不同國家的不同行為體之間相互影響的客觀狀態的結構。在承認了相互依賴不僅需要受益也需要成本之後，這兩位作者對現實主義的算計方法和相互依賴的算計方法進行了區分。根據現實主義的觀點，當均勢中的一方成功地建立了一種現狀時，其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所失—雙方是零和關係。但是，如果大多數或所有各方都希望維持現狀，那麼他們就通過合作獲取收益。儘管「在傳統的軍事安全政治

和經濟生態相互依賴政治之間」有共同點，但兩者之間的差異卻是顯著的。因此在國際關係史上，相互依賴第一次找到了一種自動引導國家避免政治糾紛的方法，它通過對國際機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扮演的功能價值的分析，說明國際機制對於促進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對減少世界政治經濟中的紛爭與不和是有價值的，對管理國際相互依賴是有意義的。

隨著通信、交通、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相互依賴成為國家與地區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特徵。一般認為，相互依賴理論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學派思想理論的一個分支，狹義相互依理論的實質是對經濟相互依存的政治分析。基歐漢和奈提出的複合相互依賴被看作是狹義相互依賴的精髓。

《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也為國際制度理論做出了貢獻。基歐漢和奈針對現實主義的一些核心假設，提出了自己的複合相互依賴模式；指出非對稱性相互依賴是一種權力資源，從而將權力與相互依賴聯繫起來，並運用「敏感性」與「脆弱性」這兩個概念，深入探討了相互依賴的非對稱性問題，充分地論證了相互依賴對國家間關係和國際社會的重要作用。兩位作者並拋棄「國家是國際唯一行為者」的主張，重視對在各層次參與國際事務的各種行為體的研究，對國際制度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作了肯定的分析。作者十分強調「國際組織不僅僅是權威法律的來源，還是把政策網絡制度化的實體，在國際組織內跨政府的政策協調和建構聯盟就可以實現」。在這兩位學者的努力下，國際制度越來越受學術界的重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大約可以把握互賴理論的發展脈絡。基歐漢和奈立志在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創立獨立研究綱領的學者共同起步；而後，他退回到傳統主義的核心假定，接受現實主義對國際行為體性質及其社會環境的假定，例如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體系的基本特徵，國家是單一、理性、最主要的國際行為體。他承認，自己將注意力重新轉向國家，是因為認識到非國家行為體仍然從屬於國家，跨國行為體實質上通常由來自特定國家的人所管理，仍然是以國家為紐帶。

<sup>45</sup>(Keohane,1990:27)因而承認國家是國際政治的「關鍵行為體」，走向「中間道路」(middle ground)。

基歐漢和奈所建構之互賴理論的觀點在西方世界政治理論爭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最有價值之處在於：他們並不是試圖把不同的立場鑄成一成不變的陳規並使之完全互為敵對，而是認識到，要努力進行理論綜合，致力於將不同的研究方法結合在一起來理解錯綜複雜的世界事務。正如基歐漢和奈所言：『《權力與相互依賴》並不認為世界政治「一切都是嶄新的」，我們並不尋求否認現實主義所有觀點的正確性，或提出全新的理論來替代現實主義。我們的目標是，尋求建立一種看待世界政治的方法，幫助我們理解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制度化國際合作的模式，同時保留現實主義關於世界政治中權力和利益作用的核心洞見。』(門洪華，2002：29)可以說，互賴理論融合了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家之長，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兩位作者在《權力與相互依賴》2001年新版中進一步強調，通訊革命使得世界社會的交流渠道呈幾何數的增長，從而使複合相互依存的概念進一步加強。在全球主義時代，國家之間的交流是多邊的、全方位的，而不再侷限於單邊、地區和經濟的界限，地理距離已經不再有意義。以美日關係為例，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聯繫是多方面的，各種聯繫是相互影響的，而不能把它視作簡單的雙邊關係。相互依存為民族國家帶來了更多好處；同時，如果處理不當它也將使國家付出代價。在一個網絡密度不斷增加，機構速度加快，跨國參與者越來越多的全球主義時代，處理好複合相互依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基歐漢與奈有關互賴理論學術思想及其著述啟迪了幾代學者關於世界政治圖景的認識，並隨著全球化和相互依賴的進一步深化，這種啟迪作用將繼續並將呈現增強的趨勢。因為互賴理論具有「中間道路」與「中庸之道」的性質，符合時代潮流，越來越多的美國政治學者都逐漸認為這一學派所體現出的溫和性具有相當大的合理性，(Neumann,1997:130)也正因為如此，本研究選擇互賴理論為本研究的主要理論基礎。

互賴理論作為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的部份，世界秩序的相

---

<sup>45</sup>此外，這時他們把國際機制視為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而國際體系則是建立在主權和自主原則之上的，這與現實主義也沒有根本的分歧。

互依賴模式強調非主權國家型為主體和低級政治客體在世界秩序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它不像集體安全模式、世界政府模式或國際制度模式那樣主張通過建立超國家組織機構的方式，維護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穩定，而是認為相互依賴和國際合作是現代國際體系的主要特徵，相互依賴促進和平、減少衝突的特質使它成為建立、維護和變革世界秩序的有效模式。

